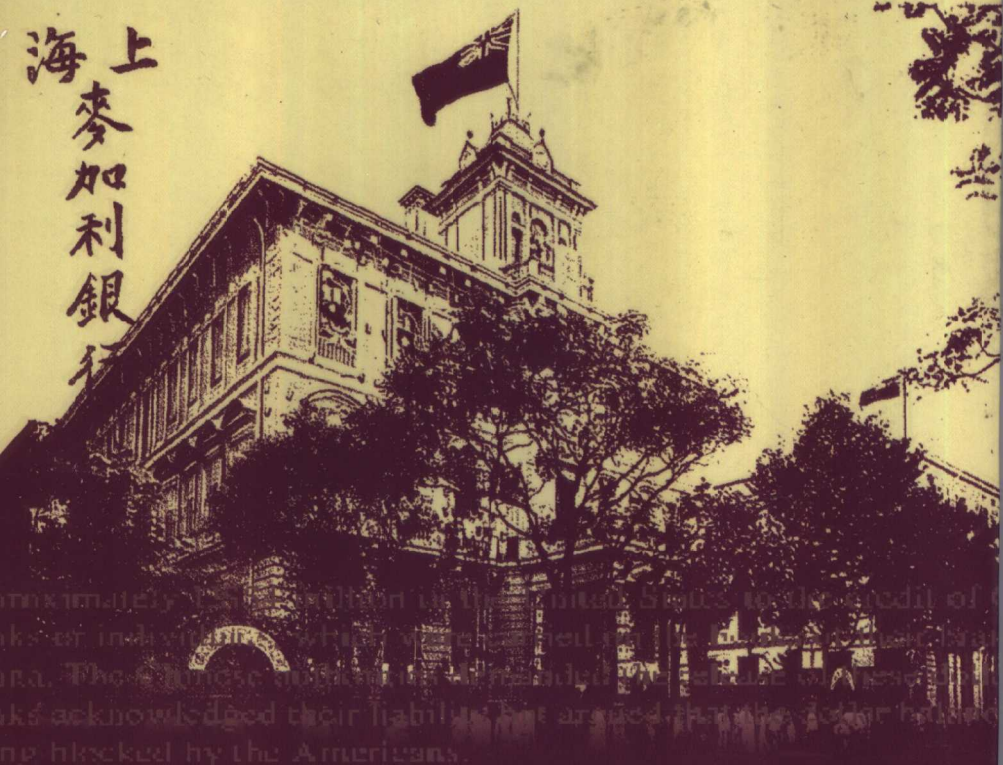


上海
麥加利銀行



approximately 100 m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credit of
banks or individuals, which was charg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wever, was
not acknowledged their liability, but argued that the dollar had
been blocked by the Americans.

Early in 1954, despite its difficult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naged to pay its employees' wages and salaries. The Chinese
were concerned, so-cal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regulatio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wever, was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other funding. As a result, action by the Labor (1949-1954)
bank's management was not tak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ould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ould
against-all-liabilities settlement were
progress slow, and little in the way of
elements of the three banks explai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 option but to stop remittances after December 1954
solution of surrendering the banks' large assets against their li
is brought up.⁴³ One local manager, in explaining the views of
ice, claimed, in a tone reminisc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王庆成 虞和平/主编

THE FATE OF BRITISH AND FRENCH FIRMS IN CHINA

被监押的帝国主义

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

[以色列] 谢艾伦/著

张平 张立 蒋清宏/译

虞和平/校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12640

F279.297

1



★201126405★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王庆成 虞和平/主编

THE FATE OF BRITISH
AND FRENCH FIRMS IN CHINA
(1949-1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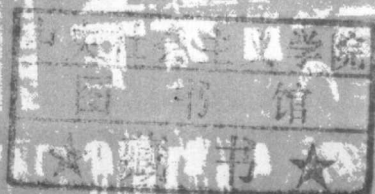
被监押的帝国主义

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

[以色列] 谢艾伦/著

张平 张立 蒋清宏/译

虞和平/校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 - 2003 - 409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以)谢爱伦著;
张平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王庆成,虞和平主编)
书名原文:The Fate of British and French Firms in China (1949—
1954)——Imperialism Imprisoned

ISBN 7-5004-4421-4

I. 被… II. ①谢…②张… III. ①外资公司—史料—
中国—1949~1954②企业—史料—英国—1949~1954
③企业—史料—法国—1949~1954 IV. F279.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8144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a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 页 2

字 数 166 千字

定 价 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编辑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更好地适应于时代,更有益于社会,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继续前进,获得新的发展。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我国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和走向世界的途径之一。因此,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于1987年创刊了这套《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十多年来,本译丛虽然刊行种数有限,但是颇得海内外学者的赞赏、鼓励和支持,为了迎接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繁荣,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本译丛。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选译外国学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侧重于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参考借鉴意义的专著。本译丛所选择著作的研究时限以1840—1949年为主,同时适当向前后延伸,以体现历史的连续性。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大多与中国学者不同。我们选择出版某书,并不意味着同意它的观点。书中的优点、缺点和错误,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知所见有限,希望海内外史学界同行给予关心、支持,提出批评建议,并且推荐选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2001年8月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庆成 虞和平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成 牛大勇 朱荫贵 张小颐
罗志田 郭沂纹 夏春涛 黄庆华
虞和平
常务编委 夏春涛 张小颐

作者简介

谢爱伦 (Aron Shai)，现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艾森伯格东亚事务专职教授，曾先后出任该校历史系与东亚学系主任。主要著作有：《东方战争的起源：英国、中国、日本 1937—1939 年》、《国际事务中的中国，1840—1990 年》，《英国与中国 1941—1947 年：大英帝国的动力》。他还出版过两部历史小说《外人之子本·哈扎尔》及《昵称玛诺》。此外，他还曾兼任两家保险公司的总裁。

前言

在此，我试图写一种略微与众不同的国际史和外交史，并试图聚焦于某些可能是更基本的，或者是更深刻的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英和中法关系中的经济和贸易要素。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正是这些要素，而不是那些纯外交来往构成了这些关系的支柱。因此，一个潜在的假设是，外交资料无论如何重要，都不足以获得对这些几十年间交织于列强跟中国之间的这些关系的全面理解，或者一种真实的和完整的图画。这种探索似乎也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那些岁月。在这一时期，就商务资本而言，金融和商务考量确实占了主导地位。

更进一步地说，在此所提出的既不是对严格意义上的双边关系，即：北京与各相关国家首都之间来回传递的外交信息的分析；也不是对日常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数量及强度的估量。而是把1949年到1954年这一时期，放在英法“后帝国的”衰退的更为广泛的背景里加以考察。在这一环境中，“撤退后的撤退”，“衰退后的衰退”，“被俘获的资本主义”，“被俘获的帝国主义”，“人质资本主义”，或者简单地说，“被监押的帝国主义”，都代表了某些新的，可互换的概念。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像在华大企业的本地经理们那样的前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非官方代表，发现他们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中某些人甚至处于被囚禁状态。他们在新政权下所遭受

的这种艰难，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在华活动的外国公司从未经历过的困难。与中国资本家的情况不同，在外国资本家的道路上所设置的那些障碍带有一种超越地方剧变之有限疆域的重要性，一种具有国际含义的重要性。而且正如本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这些障碍也构成了保障一种收入来源的方式，一种获取对资产的控制权的途径。这些资产是在数十年间的时间里由外国人积累的。

本研究不构成对1949年以后席卷中国和中国人的那些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全面叙述。它基本上更多的是对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传统中外关系，主要是中英关系的延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衰退的叙述。这种关系在此时已经被镀上了一层特别的、未知的和前所未见的经济外膜。涉及或考察有关“被囚禁的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至今为数甚少。还没有一项研究是基于新近开放的伦敦档案馆、斯威尔家族的约翰·斯威尔文件、现在可以查阅的巴黎的官方和公司记录以及可以获取的，然而却是极度受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始资料的。而且似乎没有一项研究是在帝国主义衰退，或者更坦率地说，是前殖民列强，特别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的实际崩溃和羞辱的背景下去考察其范围广泛的重要性。^①

例如《剑桥中国史》的作者们叙述了1949年以后的时代。考察了导致新政权建立的那些事件的延续关系，以及新政权的巩固和重建。但十分典型地，他们甚至没有提到成为人质的资本主义这一独特现象，以及外国企业的代表们的困境。与其他研究者

^① 关于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帝国主义衰落观点见弗兰克 H.H. 金的著作《汇丰银行史——香港分行的发展阶段和民族主义》卷四，剑桥，1991年版。这项研究使用了银行自己的档案，以及其他相关的档案和文献。也见谢爱伦：《监禁的帝国主义：英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闭》，见《英国历史评论》，CIV, No. 410, 1989年1月和谢爱伦：《质押的资本主义与在华的法国企业：中法关系的隐含因素》，见《中国研究》第12期第1号，1993年。

一样，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一问题。^①看来由于涉及到中国历史的革命性转折点，而且对其崭新的（国际与外交）维度感到着迷，国际史与外交史学家们倾向于强调新政权的成就，而不是对革命前夕的那些事件做一种严肃的和细致的研究。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据如此中心地位的帝国主义的遗产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有时外国人和他们的财产也会被提到，但是总是以一种不精确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方式。关于这一点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一位重要的中国学者在他的关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书中宣称，在50年代早期，“外国企业遭到管制并最终被没收和国有化……所有的外国资产都被冻结，外国人拥有的财产被征用……”^②这段描述既没表达出事件发生的真实顺序，也没有说出真相。外国遗产，特别是其经济成分毕竟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且城市中的外国企业在一个复杂进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经济从其几乎是封建化的阶段转化到了新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确，被囚禁的资本主义在形成中国的新面貌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更不用说是一个有意义的角色。本研究所想刻画和强调的正是这种角色。

最近由中国学者发表的三项研究，向外交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领域，引进了新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中文的。其中包括了对参与形成50年代中英关系的那些决策者的采访和与他们的通信。在《英国遭遇革命中国——1949年至1954年》中，詹姆斯·塔克—洪·唐评估并分析了在英国这样一个根基牢固的国际社会成员与中国这样一个新建的革命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③

① 《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部分，剑桥，1987年版。

② M. 迈斯纳：《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史》，纽约，1977年版，第91页。

③ 伦敦，1992年版。

他审查了参与形成英国对华政策的那些政治精英和决策机制，观察了那些政策的实施，并检讨了与英中关系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的范围内，唐以他独特的方式将中国历史从其传统的边缘状态解放出来，并将其置于历史论述的主流之中。

在《中国、英国与商人：政治和商务关系，1947—1957》中，邵文光（音译）对现存的研究实体做出了贡献。其贡献在于从创造性的视点分析了国际历史的特定问题。并通过对商务实践的检验^①，对中英商务关系的更深层次进行了透视。作为一位对外开放时代的学者，邵接触到了迄今为止他尚不熟悉的西方研究方法。他狼吞虎咽般地研究了从西方获取的大量资料，结合了自己祖国取得的信息宝藏，由此撰写了一部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将这种历史从其欧洲中心论中解救出来。此外他还使研究者们，虽然是非直接地，得到了中国文献。这些文献通常是他通过关系获取的。邵的研究包含了对多姿多彩的课题及其相关资料的讨论。这些讨论深入到了中英关系的一些深刻的要素，诸如经济的、商务的、外交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在这部细致的和精确的著作中，50年代早期的国内、国外政策及其发展都得到了探讨。并交织进了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叙述之中。中国的城市中心和外国公司在那里的活动得到了考虑。邵注意到中国当局设法完成了对大多数外国利益的逐渐获取，并没有诉诸直接没收的手段。然而这一过程仍然给西方提供了一个如此经典的“成为人质的资本主义政治”，及“曲线国有化”的事例。以至于其烙印在其后很多年里持续影响着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中国。^②

张永进的以“处于边缘的中央王国”为副标题的《国际体系

① 伦敦，1991年版。

② 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伦敦，1991年版，第15页。

中的中国 1918—1920 年》强调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国，无论其自我印象如何，已经在几十年间被认为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边缘角色，与现实世界的发展脱节。^① 这的确不是什么秘密。因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一直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国际社会在全球其他部分的扩展”。^②

此书强调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崩溃，以及中国融入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例如，巴黎和会就是在国内决策程序的反光镜中加以检验的。而中国也就被放到了一系列事件的核心地位。将中国推出全球历史画面的原罪在此被修正了。张强调中国人没有向欧洲文明的标准屈服，而是进行了一次反抗的、革命性的进程，一次对西方势力及其统治的反抗。中国人要求中外关系以一种与欧洲国家间常规关系相似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以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之间的传统方式来进行。^③

深深地沉浸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关系，张倾向于夸张列强对中国的承认、向中国发出的邀请、作为战胜的协约国的一员参加和会的工作等事件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外交发展，特别是雅尔塔协议，给世界领导人承认中国为一个平等伙伴的诚意投上了深深的阴影。罗斯福和丘吉尔似乎愿意牺牲部分中国主权、某些平等原则和其他正义观念，以看到俄国参加对日作战。^④

这三部著作和其他近期出版的著作标志着一种新的值得受到欢迎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外交画面正变得更加全面。中国之

① 伦敦，1991 年版。

② 张永进：《国际体系中的中国（1918—1920 年）》，伦敦，1991 年版，第 3 页。

③ 同上书，第 193 页。

④ 谢授伦：《英国与中国 1941—1947 年：大英帝国的动力》，伦敦，1984 年版，第 89—91 页。

角正被织进外交史讨论的“织物”中去。^①中国的国际史由此从边缘转向中心，远离了欧洲中心论的焦点，走向一种更为平衡和更为富有成果的分析。^②

唐家璇声称近期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会谈，令人想起举行建立双边外交关系会谈的20世纪50年代。这一论述是最有说明意义的。50年代的理想是让新生的制度逐渐与旧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遗产脱节。而80年代以来的困境则恰恰相反，问题是如何实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主张，以及如何取得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崛起中的、受到欢迎的资本主义风气的理想共存。

尽管这里所描述的那个时期有其独到的特性，并且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彻底研究看来可以照亮那个历史事件本身。但通过被囚禁于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折射镜，我们似乎可以学到，并在通常意义上理解更多的东西。可以假设性的预言，本研究将对更好的理解那种后来被发展成为所谓的第一、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做出贡献。本研究也可能解释资本主义列强及其公司，与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的中国当前关系的某些要素。80年代和90年代并不是两种制度在中国相互对垒的第一个时间。通常被忘记了的第一次遭遇是在50年代早期发生的。那时新崛起的政权以其独特的方式也曾经向两种制度间的某种共存开放。

本研究聚焦于英国在华企业的命运。前四章按顺序集中分析

^① 也见W.O. 沃克：《鸦片与外交政策：英美在亚洲寻找秩序，1912—1954年》，伦敦，1991年版，谢爱伦：《世界事务中的中国》（评论文章）《国际历史评论》第15期第2号（1993年5月），及谢爱伦关于詹姆斯·塔克—洪的文章《英国遭遇革命中国》的评论，见《国际历史评论》第15期第4号，1993年11月。

^② 有关这种看法的更多观点，见本书第一章和J. 奥斯特哈梅尔：《二十世纪中国的半殖民地和正统帝国：趋于框架的分析》，见W.J. 莫森和J. 奥斯特哈梅尔合著：《帝国主义及以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伦敦，1986年版。

了中英关系（强调经济事物），澄清英国方面的看法，对英国在寻求实际妥协的同时围堵中国的企图进行曝光。并透露一个详细的事例，首次显示了一个庞大的企业是如何被迫向革命压力屈服，并最终关闭了其在中国的经营活动。

不过与此同时，本书也用了专门的一章，详细叙述了还不为人知的法国企业被关闭的事例。虽然这一章仅仅是一份备忘录，而不是完整的研究，但仍可望在总结相关的（迄今几乎不为人知的）的细节上获得成功，并给对本研究至关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气氛带来一些光亮。而且并列这两个表面上相似的事例，也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

中文版致谢词

在此，我想对所有那些对我的研究给予过帮助的人表达我深切的谢意。特别感谢伦敦的约翰·斯威尔父子有限公司（太古公司）的约翰·斯威尔爵士，他允许我使用他们企业的档案，并且花费了他个人许多宝贵的时间。

在巴黎，东方汇理与苏伊士银行的总经理 M. Jean-Francois Lepetit 爽快地同意我使用他们银行的档案。M. Marc Meuleau 和 M. Mahler-Besse 帮助我在中法工商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那庞大的档案记录中找到我需要的研究资料。在此我表示我最真诚的谢意。

伦敦外交事务办公室和其他部门的档案管理处，法国的档案管理处，和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找到的中国资料形成了这个研究的梁柱。感谢伦敦的公共档案局，法国外贸部、经济部、财政预算局、国家图书馆、现代国际文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感谢巴黎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学校的同事们，在那里我用了半年的休假时间出任教学主管。

我也非常有幸能有机会和各方面人士进行会谈或通讯联系，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的发展时期，从而使得档案材料得到了扩展和补充。我特别要提到的是香港的 Izikiel Abraham；约翰·斯威尔父子公司的前雇员约翰·马奇；东方汇理银行上海分行的前经理 Jean-Louis Moren 和法国外交服务局的

M. Jean Meadmore.

真诚感谢我的朋友 Claire Ferras 对我在巴黎从事研究期间所提供的极大帮助。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的同事、亲密的朋友、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的张平博士和张立女士，感谢他们的出色的专业学术工作，他们为将本书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做出了极大的努力。非常感谢他们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虞和平教授发起并安排了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工作，我衷心感谢他的善意努力和帮助。虞和平教授的学生，蒋清宏先生翻译了附录的后两个部分、注解和书目，同样非常感谢他。

非常感谢特拉维夫大学常务校长 Shimeon Yankelevitz 教授对本书出版工作的支持。

我应该特别感谢我亲爱的夫人 Puah，没有她的投入，耐心和持久的鼓励，本研究将不会有见天日的时候。

谢爱伦 (Aron Shai)

艾森伯格 (Shoul N. Eisenberg) 东亚事务专职教授

2002 年 7 月 16 日，于特拉维夫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中文版致谢词	(1)
导 论	(1)
第一章 英国与中国,从帝国关系到正式平等化	(7)
第二章 英国的观点	(26)
第三章 中国的观点	(58)
第四章 寻求权宜之计	(80)
第五章 太古公司的关闭	(103)
第六章 法国企业的关闭:另一种情况?	(120)
第七章 非直接国有化及其后果	(139)
附录一 伦敦约翰·斯威尔父子公司(太古公司) 从中国撤离(节选)	(147)
附录二 转让契约	(164)
附录三 麦加利银行总部,伦敦,38 教区	(167)
参考文献	(170)

导 论

在此我不打算发展一种对半殖民地及非正式帝国现象的分析框架。这种尝试已经在别处做过了。^① 对历史学家来说，一种强加的框架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因为这种框架在迎合或简单地应用于那些对历史学家来说往往是先人为主的独到性和特殊性方面通常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如此，两个部分属于方法论上的显著的问题仍然在这一背景下浮现出来。

第一个问题与国际历史学作为一种强劲发展的学科有关，而第二个问题则与近年来获得重大进展的帝国主义衰败的研究领域有关。^②

国际史或外交史作为一种学术科目已经被诸如 A. J. P. 泰勒^③ 这样的学者强烈攻击了近三十年。可以说对控制和决定这种历史的经济的和其他深层力量的考察的尝试尚未足够彻底。近

① J. 奥斯特哈梅尔：《20 世纪中国的半殖民地和非正统帝国：趋于框架的分析》，见 W.J. 莫姆森和 J. 奥斯特哈梅尔合著：《帝国主义及以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伦敦，1986 年版。

② 见 W.R. 路易斯：《海湾的帝国主义》，牛津，1977 年版和 C. 索恩：《一种联盟：美国、英国与对日战争（1931—1945 年）》，伦敦，1978 年版。

③ A.J.P. 泰勒：《欧洲：繁荣与衰落》，哈曼斯沃斯，1967 年版，第 166 页。有关这个问题也见沃伦·I. 科恩就任美国对外关系史协会主席时的就职演讲，见《外交史》第 9 期第 2 号，第 101—112 页。